

三版代序

——介紹著者——

本書著者方濟生先生，是中國國民黨一個先進的忠實黨員、因為他對黨過於忠實，所以雖然從事革命廿餘年，既未被稱為要人。也沒有正式坐過黨官。現在年逾不惑，依然是個忠實黨員而已！我們必要給他加上個黨字的徽號，那末，稱他一聲『黨君子』，他是當之無愧的。

九一八事變前，他曾熱烈的從事新東方運動，九一八事變後，他感到革命的責任又加重一層，同時他覺得抗日復土的使命，唯有東北軍和東北軍事領袖張漢卿先生是最忠實的完成這個使命的先鋒，所以他在張先生歸國後，便投到張先生部下工作，意在做一個抗日先鋒隊中之一員。

他追隨張先生現已二年有餘，他本着他廿餘年的革命經驗，默察張先生之爲人，他深信張先生不僅能襄助蔣委員長完成革命大業，而且是具有抗日復土的決心，他這種信心的由來，都是張先生年來在埋頭苦幹的工作上表現出來的事實，使他不得不相信，不僅他相信，任何人都得相信！

雙一二事變，其時他在開封，後來又隨友到南京，因爲消息隔絕，使他得不到真相，但他曾對朋友這樣說：「無論如何，我相信漢卿先生決不致危害委座的生命，或者很迅速的親送委座回京。」那時朋友問他：「你說這話有什麼憑據？」他說：「漢卿先生有真性情，這就是憑據。」單看他這一句話，我們也就知他信仰張先生的真切。

他寫這本小冊子，初次在南京出版時，題名「大亞細亞主義之研究」，有一位朋友對他這樣說：「大亞細亞主義自總理講演而後，本黨同志很少

撰文來發揮，君撰此文，如果總理在世的話，定可換得一中央委員。」由這句話的意味也就可見他這本小冊子的價值了。後來他回到西安，有很多朋友勸他再版發售，我因他站在黨員著作的立場來論人論事，尙能公正不阿，不失「黨君子」本色，因向他建議將書名改爲「總理遺教與張學良」，意義是一則藉此向東北軍宣傳總理遺教，並爲張先生的思想作一引證，二則把我們長官的主張在理論方面應該給大眾一個明白的宣示。本來全書大部份是闡發總理遺教，關於張學良個人部份很少，所以我覺得這書名並不怎樣不相宜。

我認識著者雖不久，可是我們曾經共同鼓吹過真性情詩，現在把我們這次（四月一日）「西安出發時天雨」作的兩首詩寫出來，登在這裏，作爲一個紀念：

三 版代序

楞作

狂風暴雨襲冷窗！
妻忙着收拾行李，
孩子吵着要吃糖，
我呆坐在椅上，
細思量；
這樣流浪的生活，
前途太渺茫，
何日歸故鄉！？

濟生作

並非戀長安，
亦非動春感，

悶沉沉心裏總覺得有些不自在。

○ ○ ○ ○ ○

抬頭望，

雨如彈，

顆顆射在窗兒上。

○ ○ ○ ○ ○

雲飄飄，

風蕩蕩，

昨日天晴今日雨，

三 版 代 序

三 版代序

天公意態好難猜，
希望明日重見太陽光。

六

楞寫於蚌埠廿六年四月十七日

再版序

本書初次在南京出版時，曾得各方面之熱烈同情，足見大家對於中山先生遺教，已由研究而漸進於實行。作者現因事來西安，覺得西北文化亦正在復興途徑中邁進，因再版發售，藉以敲敲邊鼓。

不過這裏作者要鄭重說明，作者是同情於張漢卿先生的抗日主張，其所以同情他的主張，乃因他的主張是根據中山先生的遺教，站在擁護蔣委員長領導的立場來抗日，所以作者纔表同情，本書再版改爲「總理遺教與張學良一」，也就是這個意思。

至於雙十二事變，那與本書立論無關，不過作者對於雙十二事變，與王卓然先生同一見解，雖說動機是純潔的，但是這種舉動總覺得危險。

關於「容共」這一點，自這次三中全會根絕赤禍案通過後，中央似乎有允許共黨投誠之意，所以各地刊物對於這個問題多有討論，大家只以為共黨若能覺悟，在抗日的陣綫上少一重障得，亦未嘗非國家之幸。

末後又加一篇「覆某青年書」，這是作者答覆北平清大學生某君對於本書初版批評的解釋，惜某君原函遺失，未能登出，只登作者覆函。

這次三中全會關於言論自由案，曾有極坦白的表示，尤其是蔣委員長的談話，對於這一點指示更為顯明，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國內統一現狀下，政治基礎更臻穩固，凡屬總理遺教，我們都應該以研究所得，忠實的向中央建議，所謂「三緘其口，獨善其身。」那不是新時代國民應有的態度！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作者自識。

寫在本文前面

本文原擬投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旋聞該刊本年春季號快出版，夏季號六月方付印，嫌時間太遲，乃改印小冊子，因為字數太少，又寫了幾條時事問答，附在篇後。在此沉悶時局，大家都覺得不知走那條路纔好，擺着中山先生早經關好了的光明大路不走，只是徘徊亂撞，豈非怪事！

決定！

堅決的決定！

大家丟開一切私怨，

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

遵照中山先生倡導的大亞細亞主義，

寫在本文前面

寫在本文前面

二

向光明大路前進！

前進！

中華民國廿六年二月一日作者寫於南京旅次，窮病交困，雨雪霏霏之晨。

總理遺教與張學良·目錄·

三版代序

介紹著者

再版序

寫在本文前面

大亞細亞主義之研究

甲·緒言

乙。中山先生講演大亞細亞主義時的革命情勢

丙·中山先生對於日俄的希望

丁·王道與霸道的解釋

戊·結論

時事問答 三〇

一。中國共產黨的最近情勢

二。中國國民黨可否再容共

三。抗日的結果

四。組織殖民地國際問題

五。所謂人民陣綫

六。誰負革命領導之責

七。關於張漢卿先生的幾點

覆某青年書 四二

一。擁蔣滅黨派

二。文人 說客 謀士

三。自力更生

四。對於張漢卿先生的批評

正誤 四七

關於天津大公報記者長江先生發表的「動盪中的西北大局」文中錯誤之一點

大亞細亞主義之研究

甲·緒言

中山先生倡導大亞細亞主義很久，不過民國十三年由廣州北上，路過日本，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講演這個問題時，才定出較爲具體的方案，同日晚，在神戶東方飯店各團體歡迎席上又發表了「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講演詞，這兩次講演詞，是中山先生最後的講演詞，意義是互相關連的，互相發揮的，東方問題的癥結即在此，在這兩次講演詞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山先生的偉大思想，到晚年是更趨於明顯，可惜他老人家不久即棄世，假使在世的話，關於這個問題的探討，對於我們同志，對於日本，對於東方，以及整個的世界革命陣線，必有更

偉大的啓示。

我們應該知道，中山先生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文人，不是專門從事著作的，他的偉大思想，多半散見於講演詞，三民主義也只是幾次講演詞，而且民生主義最後一次講演詞標「未完」二字，足見三民主義講演詞不能包括中山先生全部思想，中山先生自序裏面也說：「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陳炯明叛變，砲擊觀音山，竟將數年心血所成之各種草稿，並備參考之西籍數百種，悉數被燬去，殊可痛恨……惟此次演講既無暇晷以預備，又無書籍爲參考，只於登壇之後，隨意發言，較之前稿，遺忘實多，……尙望同志讀者，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這正如孔仲尼哲學一樣，論語雖是孔仲尼哲學的基本書籍，但是論語也只是孔仲尼平日的演講詞，要研究孔仲尼哲學，須將孔仲尼其他演講詞及其編述，都要加

以研究，單是論語一種，不能包括孔仲尼的全部思想。所以我們研究中山主義的同志，不要祇是抱着一部三民主義死板板的苦讀，我們應該於三民主義演講詞之外，凡是中山先生的演講詞與著述，都要加以研究，我們雖然不敢說『匡補闕遺，更正條理』，然而『本此基礎，觸類引伸』，那是我們正當的責任，我們應該學大學中庸與孟子七篇的精神，來發揮中山主義的理論，孫哲生先生在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創刊號發刊詞裏面說：『我們若要使中山主義更加發揚光大，我們必須對中山主義作一種切實的研究和補充。』也就是這個意思。本文所論，大部分是就中山先生的講詞來解釋中山先生的講詞，間或有些不見於中山先生講說的，也只是『觸類引伸』而已。只是旅中缺少參考書籍，信手寫來，對於中山先生的思想，未能充分發揮，而且錯誤之處，亦在所難免，希望讀者多加指教，我們應該切

實的研究這個問題。

日人某某等亦有所謂大亞細亞主義之鼓吹，不過日人之鼓吹大亞細亞主義，是一種亞洲門羅主義，是日帝國主義的夸大狂，是要給九州三島的日皇一個亞洲的王冠，這種獨霸主義與中山先生的民族平等主義完全相反；印人某某等也有所謂大亞細亞主義者，不過印人是主張依賴日帝國主義的勢力來抵抗英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却忘記了一九一四年大戰時，日帝國主義曾猙獰的鎮壓東方各殖民地，替西方霸道做鷹犬，所以印人這種主張，只是夢想而已！退一步說，即使日帝國主義真的幫助印人推翻英帝國主義在印度的壓迫，那末，日帝國主義還不是同樣的要壓迫印度民族，這種前門去虎後門進狼的幫助，不過以暴易暴而已，於印度民族解放是絲毫無益的，所以這種失掉民族自信力的夢想，與中山先生的民族絕對獨立主義

，也是根本不同。

近年來，東方人士研究這個問題的漸漸多了，可惜我只看見一些沒有系統的片斷記載。本文恕不論列。

乙，中山先生講演大亞細亞主義時的革命情勢

曹錕既倒，當時北方軍事巨頭及各方代表均歡迎中山先生北上，即國民黨同志亦多催促中山先生趕快到北方去，一時和平統一空氣充滿全國，大家好像國家從此無事了，獨中山先生覺得那次事變『似乎受了別種勢力的牽涉，不像革命運動。』距革命成功時期尚遠，所以在廣州動身北上時，曾留二語告吾同志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在北上宣言裏及北上沿途中，無論對中國人日本人的演講或話談，都是主張革命的力

量是要建築在民衆身上，他說：『國民之運命在於國民之自決！』又說：『要真正和平統一，還是要軍閥絕種，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來作惡的帝國主義！』要實現這種主張，便標出下面兩個原則：

一、召開國民會議

二、廢除不平等條約

這兩個原則的作用是連貫的，召開國民會議是『由全國國民自動的去解決國事。』所謂解決國事，就是要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要中國真正達到自由平等地步，那就非廢除不平等條約不可，所謂廢除不平等條約，就是要從帝國主義者手裏奪回我們已失的權利，至於怎樣奪回法，中山先生很明白的告訴我們說：『我們要完全收回我們的權利，便要訴諸武力！』這種武力是怎樣運用，中山先生又說『我們中國人數有四萬萬，向來雖然

愛和平，但是爲生死關頭，也當然是奮鬥的，當然有很大的武力。如果亞洲民族全聯合起來，用這樣固有的武力去和歐洲人講武，一定是有勝無敗的。『又說：『更就歐洲和亞洲的人數來比較，中國有四萬萬人，印度有三萬萬五千萬，緬甸安南木蘭由共起來有幾千萬，日本一國有幾千萬，其他各弱小民族有幾千萬，我們亞洲人數佔全世界的人數要過四分之一，歐洲人數不過是四萬萬，我們亞洲全部的人數有九萬萬，用四萬萬人的少數來壓迫九萬萬人的多數，這是和正義人道大不相容的，反乎正義人道的行爲，終久是要失敗的，而且在他們四萬萬人之中近來也有被我們感化了的。』又說：『受壓迫的民族不但是亞洲專有的，就是在歐洲境內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國家不只是壓迫外洲同外國的民族，就是在本洲本國之內也是一樣壓迫的。』我們在這幾段話裏面，可以看出中山先生的反帝武力是包

含下列幾種：

- 一、中國固有的武力
- 二、聯合亞洲全部民族
- 三、其他同情我們的民族
- 四、帝國主義內部被壓迫民衆
- 五、其他被壓迫民族

要實現這種聯合，首先便是中國內部統一問題，要中國內部統一，便要軍閥絕種，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作惡的帝國主義，日本是一個帝國主義，同時又是一個亞洲民族，所以日本民族幫助中國革命勢力，或幫助中國軍閥勢力，這是與中國內部統一問題關係很大，中山先生北上時，趁候船之便，繞道日本，就是要看看日本對於中國的態度究竟是怎樣

，若能用他的偉大革命精神感化日本，當然是好；若是日本始終不懷好意，那就要設法打破這種串通作惡的勢力，所謂解決國事之根本辦法，其重心實在日本，不在北京，我們只要細察北方軍閥連年互訐，後幕都是日本帝國主義作祟，曹錕雖倒，北方局面只是暫時苟安，要達到中國真正的和平統一，那是要內外問題都得到根本解決。

再就當時亞洲其他被壓迫民族革命情勢而論，印度的反英運動，安南的反法運動，菲律賓的反美運動，朝鮮的反日運動，都是繼續不斷的前仆後起，中國在被壓迫民族當中，總可以說是一個弱大民族，只要中國民族能掙扎起來，聯合其他被壓迫民族共同奮鬥，打倒帝國主義並不是一件難事，所以當時中山先生倡大亞細亞主義，亦確是革命潮流到了這個階段。

中山先生畢生的革命工作。都是從大處着手，大的問題解決了，枝節

問題自然不成問題，若以爲大的問題困難，畏縮不行，只是在枝節上尋辦法，那就愈弄愈糟，枝節愈多，糾紛愈大。民十，中山先生就大總統職不久，旋即誓師北伐，當時西南內部未解決的問題很多，北伐之舉，不僅軍事上感到種種困難，就是經濟上也是感到種種困難，但是這些困難，中山先生都不顧，勇往直前，誓不與賊兩立！有人說中山先生這種主張，是與諸葛武侯北伐同一意義，其實，討賊意義雖同，不過武侯北伐是爭正統，中山先生北伐是爭民族的生存，這一點是不同的。可惜當時陳炯明眼光太小，私心太重，由阻撓北伐而至於叛變，真是中國革命史上一大恨事。民十三，曹吳失勢，當時所謂和平統一，只是暫時的苟安，所有政治問題，軍事問題，社會問題等等，都沒有解決，而中山先生却統統歸之於國民會議解決，至於解決國事之根本辦法是必須廢除不平等條約，要廢除不平等

條約又必須打倒帝國主義，要打倒帝國主義所以倡大亞細亞主義，這樣說來，該是多麼曲折而嚴重的問題，就表面說，所謂大亞細亞主義與當時解決國事，似乎是不急之務，而實際非如此則國事不能得到根本解決。有人疑中山先生這種主張是轉移對內視線到對外，其實，並不是對內對外問題，用意全在民族生存上。

丙·中山先生對於日俄的希望

當中山先生講大亞細亞主義的時候，那時聯俄熱度最高；在另一方面，自二十一條而後，日本對中國的不懷好意，是日甚一日，所以那時中山先生對於日俄的希望也是不同的。

談中日親善的口頭禪都是把「同文同種」作爲應該「共存共榮」的理

由。中山先生却只常用『兄弟之邦』這種說法。事實上『共存共榮』的需要，只問是不是站在同一利害關係上，若是站在同一利害關係上，同文同種固然要共存共榮，就是不同文不同種，也應該共存共榮。反轉來說，若不是站在同一利害關係上，不同文不同種固然不能共存共榮，就是同文同種也不能共存共榮，中日同文同種，如果站在民族平等地位上，利害關係同，固然應該共存共榮；中俄不同文不同種，若能站在民族平等地位上，利害關係同，也是應該共存共榮的，中日是兄弟之邦，中俄也是兄弟之邦，即其他被壓迫民族，只要是站在同一利害關係上，都應該共存共榮，明乎此，可以與語大亞細亞主義矣。

日本地居亞洲，而且是亞洲一個最强的獨立國，關係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當然是很大。所以中山先生說『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那一天，就是

我們全亞洲民族復興的一天。』又說：『從日本戰勝俄國之日起，亞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歐洲，便發生獨立運動，……這種獨立的事實，便是亞洲民族思想在最近進步的表示，這種進步的思想發達到了極點，然後亞洲全部的民族才可聯絡起來，然後亞洲全部的民族獨立運動才可以成功。』讀中山先生這兩段話，可見亞洲民族解放運動是互相關連的，但是在事實方面，日本民族獨立後，雖然接着波斯土耳其阿富汗暹羅菲律賓賓幾個民族得到了獨立，其他還有印度安南緬甸朝鮮……這些被壓迫民族是沒有得到獨立，其所以不能得到全部解放的原因，雖然各民族的環境不同，或沒有得到時機，然而不能取得聯合戰線，這是一個極大的關鍵，就是已經得到獨立的民族，也是有日本土耳其兩國是完全獨立，其餘幾個獨立國仍然是常常受到國際的威脅。

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日本獨立之後，不僅不幫助亞洲其他民族獨立，反而抱侵略主義來併吞其他民族，壓迫其他民族，甚至幫助西方帝國主義來壓迫東方弱小民族。這樣還能說是共存共榮嗎？其實，日帝國主義也是枉費心機，資本主義發展已到最後階段，人類總結賬日期快要到臨，一反乎正義人道的行爲終久是要失敗的！『現時東方情勢，北自蘇俄，南至南洋羣島，可以說都是日帝國主義的仇敵，日帝國主義的武器雖然利害，決不能完全消滅這廣大的羣衆，這些利害關係相同的勢力，到那時自然趨於聯合，結果誰勝誰敗，自有分明。所以當時中山先生希望日本民族做東方王道的干城，不要做西方霸道的鷹犬，這並不是偏在中國或東方其他弱小民族方面說的，其實也是爲日本民族打算的，可惜日帝國主義執迷不悟，所謂德日同盟，意日同盟，還不是繼續爲西方霸道做鷹犬，真是辜

負了中山先生一番好意。

其次談到蘇俄，蘇俄地跨歐亞兩洲，說他接近西方霸道也可，說他接近東方王道也可，但是中山先生那時對於蘇俄的希望，可謂十二萬分的誠懇，在大亞細亞主義演講詞裏不僅說蘇俄是主張王道，不主張霸道，而且又說：『俄國現在要和歐洲的白人分家，……他極力主持公道，不贊成用少數壓迫多數，像這個情形，俄國最近的新文化，便極合我們東方的舊文化，所以他便要來和東方攜手。』俄日兩國不僅世仇，而且立國主義亦極端相反，當時中山先生對長崎記者談話，直說：『中國革命的目的和俄國相同，俄國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國相同，中國同俄國革命都是走一條路，所以中國同俄國不只是親善，照革命的關係，實在是一家，至於說到國家制度，中國有中國的制度，俄國有俄國的制度，因為中國和俄國的國情彼

此向來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這裏很明顯的中山先生所謂中俄革命都是走一條路，當然是指同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所謂中國有中國的制度，當然是指中國是以三民主義建國，所謂俄國有俄國的制度，當然是指俄國是以共產主義建國，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俄國並不是一個純粹的亞洲國，就大亞細亞主義字面而論，似乎不甚符合，而中山先生却說「中國與俄國不只親是善，照革命的關係實在是一家。」足見中山先生所倡導的大亞細亞主義，並非全指地域而言，只因被壓迫民族居亞洲爲多，故以此爲號召，而實際則純是指民族解放同一利害關係而言的。

中山先生臨終時猶致電蘇俄，諄諄致意，而對於同文同種的亞洲民族日本，則絕未提一字，足見中山先生對蘇俄的希望，是較日本爲親切。蓋日本侵略大陸政策，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日本歷代君臣一

實的主張，以中山先生的偉大革命精神尙不能感化，然則今日所謂中日提攜者，在日帝國主義當然是有作用，在中國簡直是太不自量。

丁、王道與霸道的解釋

照中山先生在大亞細亞主義裏面所講，王道與霸道的界說如左：

王道：用仁義道德感化人

霸道：專用武力壓迫人

這裏中山先生所謂「用仁義道德感化人」的王道，是「和平奮鬥」的意思，與舊時「垂拱而天下治」的辦法不同，而且並沒有說個「專」字。所以又說：『不過對於歐洲人只用仁義去感化他們，要請在亞洲的歐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們的權利，那就像與虎謀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們要

完全收回我們的權利，便要訴諸武力。」這個意思就是說我們的奮鬥是用和平的辦法，我們並不是不要武力，不過我們的武力是用來『自衛』的，不是用來『侵略他人』的，我們用武力是發揚仁義道德的精神，以仁義道德固有文化做基礎來吸收新文化，所以又說：『要造成我們的大亞細亞主義應該用什麼做基礎呢，就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做基礎，要講道德，說仁義，仁義道德就是我們大亞細亞主義的好基礎，我們有了這種好基礎，另外還要學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

所謂『共同奮鬥』，是站在民族平等立場來聯合共進，與舊時尊重本國爲『天朝』『上國』，把外國當作『夷狄』『犬馬』，是不同的，所以中山先生又說：『我們要講大亞細亞主義，恢復亞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義道德做基礎。聯合各部的民族，亞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勢力。』不過這裏

要說明的，中國在被壓迫民族當中，就歷史文化土地人口而論，總算是一個『老大哥』，所以中山先生把這由民族平等而進世界於大同的重大担子，在『共同奮鬥』的原則之下，希望中華民族的民衆應該多負責任，民族主義第六講說：『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便沒有希望。』讀了這段話，我們知道我們的使命是如何的的重大，我們雖然不敢說中華民族是應該執亞洲的牛耳，但是我們發揚王道的責任是不能放棄的。民二十，余與居覺生前輩談東方問題，他說：『世界問題的關鍵在東方，東方問題的關鍵在中國，只要中國問題解決了，世界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問題好像一把傘，只要這把傘能撐開，可以遮雨，可以抗日，人類的安全掩護就在此。』這幾句話也是很明顯深切，實

際情形也確是這樣。

所謂『專用武力壓迫人』的霸道，這裏我們也應該明白中山先生並不是詆毀武力，只是用武力來壓迫人的這種武力是應該詆毀的，而且又專用武力，那就很明顯的是沒有絲毫正義人道的，中山先生又重申其詞說：「只見物質文明，只有飛機炸彈，只有洋槍大砲，專是一種武力的文化，歐洲人近有專用這種武力的文化來壓迫我們亞洲，所以我們亞洲便不能進步，這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用我們中國的古話說就是霸道。」其實，中山先生這種引用古語，還是近於客氣，中國古時所謂霸道，並非專用武力，戰國時是霸道盛行時期，齊桓晉文之徒，還是有相當的正義，那能比得上現時帝國主義的兇惡，我們要是不客氣的說，現時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簡直是獸道，獸類是只知道弱肉強食，沒有絲毫人道的。有人說「

這話也未免說得太過，歐洲人也並不是專用武力，即如耶穌教的愛人主義，國際聯盟的和平主義，又何曾不是正義人道？又何曾不是仁義道德？」這話在表面看似乎有理由，然細察其實，則完全是虎蒙羊皮的伎倆，我們雖不敢侮辱耶穌創教之始的善意，但是現時帝國主義者之利用耶穌教來作文化侵略的工具，用作飛機大砲的掩符，不僅與耶穌創教之始意不合，就是這班耶穌教徒本身做了工具而亦不自覺。至於國聯，那更是滑稽，關於國聯的批評，方子樵先生在出席第十四屆國際勞工大會返國後報告書裏說得很明白：「國際聯盟自成立以來，他所宣示的目標是以和平手段解決國際間的糾紛問題，其實，第一是各帝國主義者利害衝突的排解機關。第二是幫助各帝國主義者欺壓弱小民族。」這幾句話把國聯的真面目可以說是完全揭出。

霸道文化就是西方文化，王道文化就是東方文化，關於文化這個問題，近幾年來，所謂文人學士名流，曾打了很多筆墨官司，我本可不必再多說，不過我覺得東方近百年來的文化，確實較百年前不同，這一方面固然是受了世界潮流的激變，一方面也是為生存而前進的象徵。我這裏根據中山先生的講演詞，試將東方新舊文化與西方文化列一比較表如左：

東方舊文化 東方新文化 西方文化

自尊的 互助的 侵略的

消極保守 和平奮鬥 極端功利

重文輕武

道德為主
兼用武力

專用武力

戊、結論

民十八，余北上從事新東方運動，當時同人曾決定根據中山先生大亞細亞主義來研究東方問題，鼓吹東方革命，在新東方創刊號本刊使命論文裏面曾標示我們的三個使命：

一、先以絕對客觀的態度，應用歸納法，把東方各種問題調查描寫出來，以便創造一個獨立平等的新東方。

二、怎樣團結融合東方各被壓迫民族，以共籌解決整個東方問題的方略。

三、共同研究怎樣來接受西方同情我們的被壓迫民衆的好意，和怎樣提醒或剷除東方內部的蠹賊。

當時太平洋風雲雖日趨險惡，而一般支那通日本通，仍大吹其中日親善，提攜，合作，共存共榮老調，但不旋踵。「萬寶山事件」「九一八事件」風起雲湧而來，日帝國主義真面目畢露，國人始稍有醒悟。當萬寶山事件發生之時，北平各界在中山公園開會，推派我南下與各反帝團體聯絡，我南下後，接着九一八事件發生，某巨公告余曰：「國事已急，吾人惟有死中求生一法，汝速北去，應設法派人出關，援助義軍活動。」余返平後，商得中韓同志數人，自願冒險出關，備受艱苦，均經達到目的，當時關內各團體出關從事義軍活動者，東方問題研究會同志實爲首先出關之人，然而結果亦僅徒多幾次痛哭而已——回想前時吾人所標示三個使命，在此混亂渺茫局勢之下，前途真不堪設想！

顧或者說：「中山先生所倡導的大亞細亞主義，已說明是要聯合亞洲

全部民族，日本亦亞洲民族之一，且爲亞洲最有強力之國家，今舍此而不聯合，反從而攻擊之，於亞洲民族解放運動，豈不多一重大障礙？」吾人聞斯言，應酸痛萬分！猶記民二中山先生旅日時，曾語日首相桂太郎曰：「就大亞細亞主義之精神言，實以真正平等友義爲原則，日俄戰前，中國同情於日本，日俄戰後，中國反而不同情於日本，其原因在日本乘戰勝之勢，併朝鮮而有之，朝鮮果何補於日本，然由日本之佔有朝鮮，影響於今後之一切者不可以估量。」這段談話，凡中日民黨老同志多有知之者，足見破壞亞洲和平局勢，其過全在日本，不是亞洲民族不與日本聯合，乃日本不與亞洲民族聯合，不僅不聯合，且從而併吞之，壓迫之，實與其他帝國主義者同一摧殘人道之行爲，故吾人之抗日，一方面是謀我民族的生存；一方面是爲人羣打抱不平。在九一八事件發生之初，東方問題研究會曾

爲抗日宣言世界，內有一段說：「滿州佔領完成之日，卽日本法西斯恐怖
的成熟，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加緊準備開始之時，終無補於日本資本主
義的破綻，而國內勞苦羣衆和朝鮮台灣琉球民衆的痛苦，將益加劇，爲解
除我們桎梏，爲世界一切被壓迫者之解放。鞏固我們的聯合戰綫，加緊我
們的革命運動，對於行將到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首，東方弱小民族的
暴君的垂斃的日本帝國主義，予以最後致命的打擊，這是迫在目前的我們
的歷史任務。」這就是說我們的抗日，正是維護正義人道，也就是維護中
山先生倡導大亞細亞主義。

就日本民族本身來說，日本既沒有遠大眼光，誠意奉行中山先生倡導
的大亞細亞主義，而與亞洲民族聯合共進，乃決計向帝國主義途徑狂奔，
那是當然要侵略其他民族的，到了現時，在這世界嚴重的經濟恐慌中，日

本帝國主義陷於生產過剩，物價狂落，失業固定，財政紊亂的深淵，內在的矛盾反映着社會鬥爭愈迫，欲其不向大陸發展，實不可能，而且國際帝國主義鬥爭的尖銳化，法西斯勢力的飛揚，正如高橋龜吉說的：『中國方面多懷恨日本的行爲。日本方面多懷恨中國的行爲，實則其罪不在中日兩國，而在近年所起的世界大勢的變化。』所以這時我們不僅希望日本覺悟放下屠刀來與我們握手爲不可能，就是希望他『適可而止』，我們在這『適可而止』的情勢之下苟安幸存，也是不可能，蓋帝國主義的發展，非至死期是不會終止的，在大時代的到臨，那時或帝國主義埋入坟墓，或被壓迫民族永墮輪迴，這是只看雙方的鬥爭情勢如何以爲斷，所以我們中華民族若想不在時代巨輪下甘心犧牲的話，我們第一步工作，毫無疑義的是要『抗日圖存！』即說中華民族是酷愛和平的民族，但是，沒有奮鬥，都有

和平！所謂和平，與因循敷衍粉飾昇平是不同的，暨南大學教授周憲文先生在日本評論第八卷第一期論中日邦交說：「要講什麼中日親善，也得打過以後再說，什麼博物院運動場這類國家大計建設，似乎也可停止了，因為目前不是時候，目前祇有準備戰爭，一切且等打過再說！」這幾句可以說是至理名言。我們更要明瞭，在民十三時。中國社會的不平現象，中山先生並不是忽略了，苟就當時情況而論，國家社會主義似較大亞細亞主義為適宜，中山先生不此鼓吹，而獨倡導大亞細亞主義者，就是覺得中華民族若不能得到平等的解放，中國社會解決不能得到平衡的進展，所以殖民地革命是以解決民族問題為前提，以解決社會問題為歸宿，這是鉄一般的原則，違反這個原則，那就大亂無已時；三民主義其所以民族主義講在先，民生主義講在後，也就是這個道理，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當前的工作

也是要『抗日圖存！』不過這裏要鄭重說明，我們的抗日，是整個的民族鬥爭，在戰術上不一定要整齊，在指揮上是要有統一的軍令，才能勝利，中委張漢卿先生去年在西安某次紀念週上說：『我們目前只有一條路，只有在蔣委員長領袖之下與日本帝國主義拚命，我們民族才能復興！』這話真是天經地義。至於怎樣拚法，這裏我可摘錄蔣委員長在民國二十五年元旦所講『國民自救救國之要道』講詞一段，很明白的告訴我們，他說：

『精誠團結，共同努力，犧牲個人，貢獻國家，就是要我們全國國民個人能够努力自強！語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現在大家既知國家民族如此危急，無論那個都要照這格言策勵自己，明白本分，負起責任，一心一德，羣策羣力，堅定志向，共同一致向救國的目的奮勇前進！』

時事問答

問：我們明白了要實現中山先生所倡導的大亞細亞主義是要抗日，但是我們抗日只有採取長期游擊戰術，正當當的是打不過日本的，所謂長期游擊戰術，第一個條件是要團結一致，現時中國共產黨的先生們口口聲聲喊抗日，不見得是誠意吧？我只怕在中央軍抗日發動之際，即中國共產黨乘機搶奪政權之時，因為那時中央的力量不能兼顧，在內外夾攻中，必致國家破碎不堪，不是中國整個赤化。就是被各帝國主義者共管或瓜分，這種沒有充分準備，又未到最後時機的抗日，結果不過如此，怎能說是圖存呢！？

答：這種問話，可以說是中國人的一般心理，我可詳細解答。說起準備，

自九一八事件發生到現在，已經五六年了，說政府沒有準備，我却不相信，至於充分不充分問題，那就難說了，我們若想我們的武器與日本勢均力敵，那是不易辦到的，假使辦得到的話，又何必需要長期游擊戰術呢！所以現時只問抗不抗，若是不抗的話，那就根本用不着準備，時機也是一樣，若是抗日，天天是我們的時機，若是不抗日，那就永遠沒有時機，所以準備與時機這話可以不談。現時我們只談中國共產黨問題，兩年前，我也覺得中國共產黨神祕到不可思議，近兩年，我因親自參加過剿匪工作，而且長官曾派我審訊過俘虜，我纔知道中國共產黨並不怎樣神祕，中國共產黨勢力之驚人發展，中央軍之不能將共產黨全數消滅，最大原因還是政治關係，不能完全歸咎軍事，這話現時已經成了常談。不過中國共產黨現時也確實是沒有辦法。就國

際情勢說，法西斯勢力的飛揚，乃蘇俄時刻不能忘記的一個大敵，蘇俄現時也只要本身能存在，從前視爲仇敵的只要是不與法西斯合作，他都拉攏，認爲是站在同一戰綫，所謂人民陣線就是這樣產生的，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情勢之下，他們知道既不能奪得政權，這樣成事不足，壞事有餘，長期的與中央軍胡扯，終久不是辦法，在大風雨降臨的時候，只有同歸於盡，所以他們伸出手來說與中國國民黨合作，這並不是信義不信義的問題，是國際情勢逼迫他們不得不如此。就國內情勢說，中國共產黨跑到西北，算是他們跑進「煩悶之籠」，西北有共產黨的兩個大敵，一是回教徒，一是鴉片，回教徒腦子內只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穆罕默德，共產黨無論用什麼方法，他那一套是灌不進回教徒的腦子內，有一次，有個俘虜對我說，共產黨也曾招集過很多

的回教徒訓練，費盡了心血想法子，結果回教徒都溜了，而且損失了很多東西，所以西北這幾百萬的回教徒，共產黨對他們真是沒有辦法。再說鴉片，西北惟一的財源就是這個冤家，共產黨到處都是高喊打倒貪污土劣，就是稍有一碗吃的人家，也是聞風早逃，這個冤家是與有錢人特別親熱，一般窮小子雖是愛他，可是沒有錢，共產黨拿着烟土，既不能當飯吃，又不能變出錢來，真是苦在心頭，而且西北壯丁，除回教徒外，十個人中就有七八個是吸鴉片的，這樣的人試問有什麼用處，說是殺吧，殺不勝殺，所以共產黨對於鴉片，也是沒有辦法。現時共產黨跑到西北，真是跑到了盡頭，既不能再跑回南方，又不能向西發展，困在這「煩悶之籠」裏面，除了要抗日而外，試問有什麼辦法，所以就國內情勢而論，現時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也是環境逼迫

他們不得不如此，並不是誠不誠的問題。

問：說來說去，到底中國國民黨是不是可以再「容共」？

答：這裏我可以大膽的說一句「可以的」！若是怕他們在抗日戰事發動後搗亂，試問現時他們被中央軍已經打得精疲力倦，若是再搗亂，不僅中央軍要打他們，既已與日帝國主義宣戰，日帝國主義也是要打他們，他們還能存在嗎！再退一步說，中國國民黨就算把政權讓給他們，試問中國這塊肥肉，是各帝國主義養命之源，除了我們自己掙扎起來，他們無可奈何而外，若是被共產黨獨佔，中國比不得西班牙那樣簡單，那時各帝國主義馬上就要重演「八國聯軍」的舊劇，或者還不止八國聯軍也未可知，試問這時中國共產黨還能存在嗎！又再退一步說，就算蘇俄也露面出來，但是蘇俄現時正與各國訂互不侵犯條約，也只

想先將本身強健起來，而且蘇俄內都黨派互訐，至今還沒有平靜，馬上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又把中國弄糟，不見得與蘇俄有利吧？！就這兩方面來說，無論蘇俄，無論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事發動後，他們若是搗亂，是與他們有害而無利的，他們不見得都是傻瓜吧？！

問：就算蘇俄與中國共產黨都不搗亂，我們抗日也得到勝利，請問，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之後，日本是怎樣呢？中國又是怎樣呢？中國還是共產呢；還是再打共產黨呢？

答：這裏有一段很大的道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後，中國不會共產，也不會再打共產黨。大亞細亞主義的精髓是民族平等，我們所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並不是要消滅日本民族，只是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由日本覺悟份子起來執政，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各民族全解放，站

在民族平等地位、真正的共存共榮，由東方各民族的真正共存共榮而進世界人類於平等，這就是中山先生革命的最終目的。不過在我們抗日的時候，各帝國主義雖是旁觀，若是我們真的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了，那末，他們爲利害關係，也可以說是生死關頭，他們當然是要起來的，這時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我們也就毫不客氣的組織殖民地國際，（也可以說是第四國際，現時聽說脫落斯基也有組織第四國際的進行。但是恐不易成功。他們若是組織成功，我們殖民地國際就可稱第五國際。）蘇俄與中國共產黨還是要想本身存在，同樣的還是與中國國民黨合作。所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後，中國決不會共產，也決不會再打共產黨。

問：共產黨已經有了第三國際，他們還能讓我們組織殖民地國際嗎？

答：這不是他們可以阻撓的，革命事實到了這個階段，需要這種組織，這並不與第三國際衝突，所謂共產主義革命，是要全世界各民族各國家都起來，單是一個國家成立共產政府，是不能算做共產革命成功的，第三國際喊了多年全世界無產階級起來，結果沒有做到，這裏當然有很多原因，最大的原因還是資本家也很乖巧的，近二十年歐美的勞資協調工作也確實收了很大的效果，但是他們對於殖民地的壓迫是只有一天一天的加重，是沒有絲毫協調性，所以現時革命，與其喊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不如喊全世界殖民地被壓迫民衆聯合起來爲有力！這是事實問題，我們組織殖民地國際還是與第三國際合作，到了最後革命成功，人類已進自由平等之門，那時只有人與天爭，第三國際不必要，第四第五……國際都不必要，人與人是再沒有什麼爭的，

這就是所謂大同之治。

問：這一套大道理我都明白了，話又說回來，所謂「容共」，究竟是怎樣一個容法呢？還是組織人民陣線呢？還是不組織人民陣線呢？

答：這很容易解決的。所謂人民陣線，也不過容納各黨各派而已，中山先生革命目的，只是要他的主義實現，他並沒有說中國國民黨是要永遠一黨專政，所謂憲政時期、還政於民，不就是各黨各派都來參收嗎！其實，現時的政府，雖說是一切施政方針是要秉承中央黨部的決議案，而實際上，政府負責人員也並不見得都是國民黨員，將來在召開國民大會時，不僅有黨有派的國民可以參政，就是無黨無派的國民也可以參政，豈不是比人民陣線更偉大嗎！

問：「容共」之後，還是雙方共負革命領導之責呢？還是一方負革命領導之

責呢？

答：這個問題很簡單，中國只有一個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當然是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並且還要絕對服從蔣委員長的一切命令，這是因為中國造成蔣委員長這個人，不是偶然的，就是蔣委員長本人，也是由下層起來的一個革命黨人，對於中國社會各階層情形，他都明瞭，而且近十餘年，他對於中國各方面軍事指揮的經驗，以及他個人的堅苦奮鬥精神，人格學識的涵養，除了他而外，中國現時確實沒有第二個人可以領導革命的。

問：聽說張漢卿先生向中央建議容共抗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答：這個問題也簡單，他因為主張抗日，所以主張容共。他的抗日情緒，因受種種痛苦的交織，故較任何人為熱烈。他對部屬訓話常常說「

九一八事變我們已經錯過機會，現在我們再不要錯過。古語說：「城是我們的箭射出去的，還要用我們的箭射回來」。我們要彌補前失，只有抗日！」所以我覺得他的主張是推動中山先生倡導的大亞細亞主義的進展，是襄助蔣委員長的革命事業成功，現在我略舉關於他個人的幾點於左：

一、中國革命的當頭問題，就是收復東北失地，他是東北將門之子，皇姑屯慘案的印象，東北民衆是永遠不能忘記的，他們爲追念張雨亭先生，所以對於張漢卿先生都是真誠的愛護，尤其是張雨亭先生的舊友與舊部。

二、他的性情完全是北方人慨慷悲歌的習氣，他的思想是純粹的東方新文化，他因爲主張抗日，所以主張容共，並不是他的思想相信

共產主義。

三、他自從受了九一八事變的教訓，加以蔣委員長偉大人格的感應，他改變了從前的人生觀，走上光明之路，他這種堅毅的勇敢的向上精神，確是令人可敬！

四、他現年只三十幾歲，年紀輕，身體強健，就是在軍中他還是每天讀書求學，鍛鍊身體，處處是遵照蔣委員長規定的新生活去做，在這多難的國事前途，他是不怕艱苦的。

五、他的行爲質直，他的信仰單純，他腦中只崇拜蔣委員長一人，他的一切都是真性情。

至於民十七東北易幟，民十九進兵平津，民廿二他將兵權交給中央，很坦白的出洋，後因反對內戰才回國，這都是他擁護統一，擁護中央的事

實表現，以及連年他追隨蔣委員長之後的埋頭苦幹。就是國破家亡流離困苦，而東北軍，雖近十年國內屢次發生局部變化，而東北軍在他領導之下，擁護統一，擁護中央，始終並無一人離心離德，這都是他平日能以手足真誠待部屬，故能收感應之效。所以雙十二事件之後，偉大的蔣委員長能原諒他，偉大的中央諸公能原諒他，全國民衆都原諒他，原諒他的意義當然是要他報仇雪恥，收復失地，襄助蔣委員長完成革命大業！

覆某青年書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於南京

前日接到吾弟的來函，對於拙著「大亞細亞主義之研究」的深刻認識與直率的批評，令我起無限敬愛！不過有幾點因為關係太大，不得不再為吾弟一言：

一、吾弟戴上我一頂「擁蔣滅黨派」的大帽子，愚兄是不敢接受的。先說擁蔣，林主席在國府某次紀念週上舉手喊：「擁護蔣委員長」！汪精衛先生在中央某次紀念週上說：「我們要在蔣介石同志領導之下推進革命」！林汪二公尚且如此，愚兄何人，敢不擁蔣，這也是蔣本人做到了這地步，現時局勢，假若沒有他，那真不堪設想！雖然吾弟並沒有說愚兄擁蔣爲不對，可是帶着一個「滅黨」的連詞，那就問題大了，吾弟將以愚兄贊成「容共」爲滅黨耶？這裏愚兄只覺得黨之滅不滅，完全在乎黨員的奮鬥努力不努力，與容共似無多大關係，總理在世時也曾容共，黨並沒有滅，這次三中全會的根絕赤禍案，似乎含有允許共黨投誠之意，所以各地報章雜誌對於這個問題很多討論，大家也只以爲共黨若真能覺悟，在抗日陣綫上少一重障礙，亦未嘗非國家之幸。其實，愚兄也是多操心，擁蔣的大功

愚兄不敢有什麼希冀，滅黨的大過愚兄也不敢背這塊冤牌。

二、吾弟又重疊的戴上我些『文人』『說客』『謀士』小帽子，愚兄也是不敢當。提起『文人』這個名詞來，愚兄真是慚愧萬分，愚兄幼年因家貧失學，壯年又因黨的關係亡命，現時又因不善處世，致漂零行乞，半生來東竄西竄，那有閒心讀書學文，偶然逼到萬不得已時寫點稿子，也不過幾句經驗俗語而已，實在談不上什麼『文』。至於『說客』『謀士』的話，那更是不敢當，愚兄頻年也只屢向中央作酸痛的呼號，無論在什麼地方並沒有替任何人策劃過個人利益的事件，想當年孔孟終日遑遑，釋耶沿門托鉢，我們能說他是『說客』『謀士』嗎？愚兄仗無，雖然不敢比這些聖哲，可是憂世之心，憫人之念，未嘗刻忘也！

三、吾弟『自力更生』說，極有至理！這句話是由西諺『天助自助』

脫胎而來，用在個人奮鬥，叫天經地義，用在被壓迫民族復興運動上，那只有一面的理由，在舊時閉關時代、猶可說也，在現時複雜叢生的國際情勢下，殖民地解放鬥爭的力量極其微弱，孤軍奮鬥，那是很難收效的。這裏我並不是反對吾弟『自力更生』說，我是覺得培養自力之外，還要借助他力，總理遺囑『喚起民衆』是培養自力，『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借助他力，但吾弟對於他力只主張利用，並不主張任何聯合及什麼障綫，（原文我忘記，彷彿是這個意思。）雖說「聯合」與「利用」字面不同，意義似無多大分別，但是運用上確有分別，比方說，我們利用朝鮮來抗日，或說利用印度來抗英，這話我們不僅不能說，也不忍說，聯合是共同奮鬥，利用是想佔便宜，鵠蚌相爭，漁人可得便宜，虎豹相鬥，驢子決不能得便宜，這是一定的道理，弟意能轉向否？說也奇怪，民十八愚兒

在太平經商時，也曾認識幾個清大學生，我總覺得清大學生有一特點，卽是「洋氣」太足，猶其是清大教授胡適之蔣廷黻輩，「洋氣」更足，他們平日的言論，好像要把整個中華民族國民交給歐美文明人訓練訓練才好，在這樣師友環境中，而吾弟獨唱『自力更生』之說，這種思想，不僅超過清大學生，而且超過清大教授，可謂青出於藍。

四，吾弟對於張漢卿先生的批評也有不當之處，吾弟說他只是蔣委員長個人的信託，這一點，愚兄也要略加說明，他是一個軍人，蔣委員長是軍事最高長官，最高領袖，他的真誠崇拜蔣委員長，是他的天職，是他的美德，不能以愚忠目之。

最後還要請吾弟暫時丟開書本見解，從實際情形來分析以上各問題，或能得到更深刻的認識。

正 誤

▲關於天津大公報記者長江先生發表的『動盪中的西北大局』文中錯誤之一點

我對於天津大公報記者長江先生平日發表的文字極愛讀，我愛讀他的文字不僅是愛他的文字技術好，尤其是愛他告訴我們的新聞消息確實，持論公正。可是關於雙十二事變之經過，他在天津大公報上發表的『動盪中的西北大局』一文，大體尚不錯，唯有『共產軍以事後參加之地位而轉成爲政治上之領導力量。』一語，西安方面諸友對此多致不滿，據說因與事實太不相符，茲將諸友所述各點列後：

一。長江先生在『動盪中的西北大局』文中已經說過：『雙十二之突變，共軍並未參加預謀，其關係人員之入西安，乃在事變四日之後

• 『查八項主張通電乃十二日發出，此電在雙十二事變政治作用上極爲重要，共黨既未事先參加預謀，則此電當然非共黨所知，這種政治根本原則共黨尙不知，何能目爲領導？若謂共黨事後參加有這種企圖，企圖究非事實。

二• 卽說事變發動共黨雖未參加預謀，而八項主張固早經共黨之同意，查八項主張各報所發表：

- 1,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負責救國
- 2, 停止一切內戰
- 3, 立卽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 4, 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 5, 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

6, 開放民衆愛國運動

7, 確實遵行總理遺囑

8,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此八項主張字句至爲明顯，不僅毫未含有共產主義理論字樣，且第七項已明言『確實遵行總理遺囑』，苟爲共黨所領導者，卽不稱『馬克斯遺囑』或『列寧遺囑』，就一般民衆立場而言，亦詆能稱『孫中山先生遺囑』，『總理』之稱，乃純係對中國國民黨黨員而言，中國共產黨黨員豈肯稱孫中山先生爲總理耶？

三·就政治形態而論，事變後，陝甘兩省省政府負責人員並無共產黨黨員參加。

四。若謂共黨曾在西安發行刊物，遂指雙十二事變係由共黨領導政治

，但現時中國國內繁華市區，常有共黨刊物發現，即在南京亦間有此種怪現象，至於上海北平天津等處，則共黨發行的刊物，更是司空見慣，然則此等政治區域，均可目為共黨領導政治耶，

五。共黨本身現時亦感覺共產主義不適宜於中國，願放棄其過去主張，而投誠我中央政府，一致對外，彼本身政治主張尙且放棄，又何能領導他人耶？

前述各節，均屬事實，不知長江先生所謂「共產軍為政治上之領導何力量」者，果何見而云焉？不過這裏我們要鄭重說明，張漢卿先生因為主張「抗日」，故主張「容共」，就抗日立場說他主張收容共產軍來增厚抗日力量，這一點他是不能否認的，若謂雙十二事變係由共黨領導政治，則與事實太不符，抗日乃我全國國民之共同主張，何竟目為共黨的政治領導？！長

江先生動筆未免失慎！當雙十二事變發生之初，其時因交通斷絕，致外間發生種種誤會，或謂西安城內已懸紅旗，或謂毛澤東在西安民衆大會演說，或謂紅軍在西安市內公開活動……等類之謠傳，長江先生豈亦爲此類謠傳所惑，遂據以爲實而筆之於文耶？當時中外人士往來西安者甚多，事實究竟如何，共產軍是否有領導政治的力量，中外人士均可爲證也。

以上均爲友人所述。

當事發生時，作者適因事已離開西安，故當時實際情形作者亦不甚明瞭，至事件完全和平解決，作者返西安後，詢之各方朋友，始悉當時所謂共產軍之參加，事極簡單，並不如長江先生所說之重要。總之，對於共產黨看得太神祕，這是國人的一般通病。八年前，新東方運動在華北初發起時，也曾有人說我們團體內有共黨領導，甚至說我們都是共黨，當時我曾

與北平世界日報主筆羅敦煒先生引爲笑談，羅先生說：『共產黨吃飯，不是共產黨也吃飯，不能說凡吃飯者都是共產黨；共產黨打倒帝國主義，其他革命黨也打倒帝國主義，不能說凡打倒帝國主義者都是共產黨。』這幾句話說得雖然近於滑稽，而實在是至理。長江先生對於雙十二事變之觀察，大約也是犯了對於共產黨看得太神祕的毛病，好在中國共產黨現時已有覺悟之表示，這種神祕也快要揭穿了，以後大家也省得許多麻煩。

三版書後

這次楞弟忽然高興，寫了一篇代序，說了一大套楞話，並把我們作的兩首真性情詩也寫上去，到是序文中另成一格。可是，承他抬愛，又給我一項「黨君子」的帽子，我實在是愧不敢當，不敢領受高情。

我自己又寫了一篇「正誤」，這是關於雙十二事件的一重公案，我寫這篇稿子的用意只是覺得雙十二事件，無論兵諫也，叛變也，兵諫是自己人兵諫，叛變是自己人叛變，這筆賬不應記在共產黨頭上，而況共產黨本身還否認這件事。

全書稿子是四月廿二日交給元大，當時說明五月一日交貨，不料元大連日因營業甚忙，遲至五月七日書始印完。因為書的大部分是翻印，新添

的稿子很少，我自己連日又因腦病復發，懶得用神，關於校對，係由元大負責，以致錯誤甚多，真是對不起閱者。

五七，提起這個紀念日來，我們真要痛哭一番纔好，本書三版剛巧撞着這個日子出版，這雖是無意中給作者一個暗示，也可以說是給我全國同胞一個警告！

濟生寫於蚌埠旅次，

時在暮春之季，江南草長。